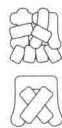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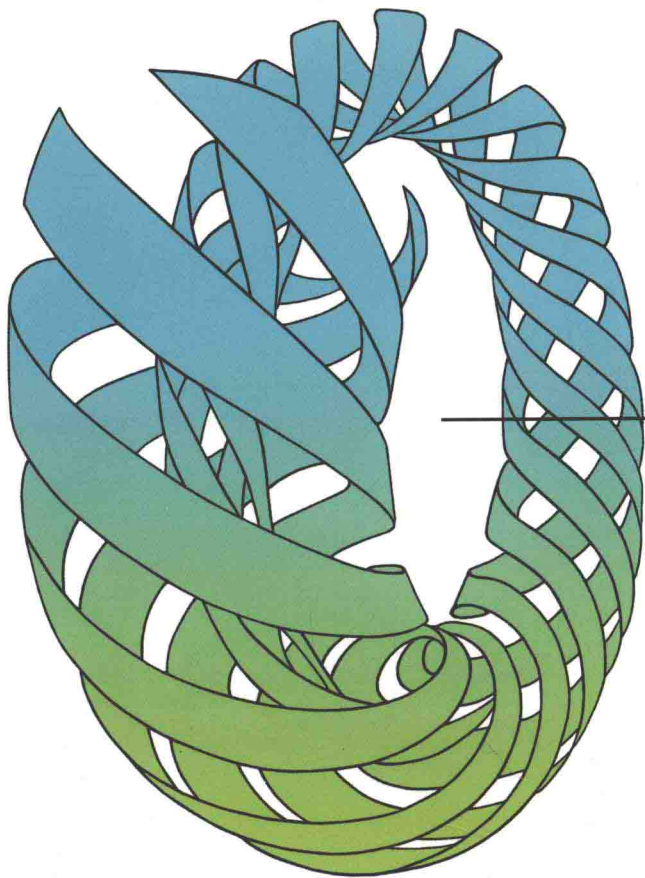


末日船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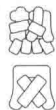
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分析

罗小茗——著



热风 讲义与读本
主编 王晓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热风·讲义与读本

主编 王巍明

末日船票

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分析

罗小茗——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日船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分析/罗小茗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热风·讲义与读本)

ISBN 978-7-208-13391-4

I. ①末… II. ①罗… III. ①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0600 号

责任编辑 薛羽

封面装帧 胡斌 刘健敏

末日船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分析

罗小茗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 插页 4 字数 250,00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391-4/G·1759

定价 48.00 元

目 录

序言 通向未来的船票:作为通识教育的文化研究 / 1

- 一、“船票”的难题 / 1
- 二、通识教育的地形图 / 7
- 三、以文化研究的方式教育/改造社会 / 13

第一章 作为问题的当代生活 / 20

- 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 21
- 二、自相矛盾的“现代” / 33
- 三、中国的“现代”态度 / 43

第二章 当代生活中的“文化” / 51

- 一、就是一套生活方式吗? / 52
- 二、作为武器的“文化” / 57
- 三、文化研究:敲碎硬壳 / 65

第三章 “上大学”:消费还是生产? / 71

- 一、现代大学的兴起:两手空空的力量 / 71
- 二、变革中的理念:从“新民”到“人力” / 76
- 三、“一流”之争 / 89
- 四、身份的困惑:“大学生” / 100

第四章 消费之惑 / 109

- 一、“喋喋不休”的商品 / 110

- 二、意义的生产：表征 / 113
- 三、呼唤“消费者” / 123
- 四、我们生活在“消费社会”吗？ / 136

第五章 网络时代的知识生产 / 150

- 一、当技术刺入“现实” / 152
- 二、你是潜在的技术决定论者吗？ / 160
- 三、编码/解码，拼的不仅是智商 / 173
- 四、“利用真理，有所作为” / 185

第六章 谁是“大众” / 193

- 一、面目不清的“大多数” / 194
- 二、霍克海默 vs. 费斯克 / 203
- 三、知识分子和大众 / 215

第七章 何谓“市场” / 225

- 一、“1, 2, 3, 我们都是经济人” / 227
- 二、一项发明：市场诞生记 / 235
- 三、争夺命名权 / 243

第八章 何谓“国家” / 252

- 一、可爱的国家 / 255
- 二、全球化时代的“跨国国家” / 272
- 三、一条叫做“中国”的道路 / 280

结语 “遥望”的生活感 / 287

后记 / 296

序言 通向未来的船票： 作为通识教育的文化研究

人只能通过经验来学习(你会说真该死,对吧?),而这个过程必然是一个不规则而且缓慢的过程。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

一、“船票”的难题

2012年年末,玛雅预言的“末日”逼近。一时间,“世界末日”成为最吸引眼球的话题;不仅各大媒体纷纷出炉“末日”专题,就连淘宝商家也做起了兜售“末日船票”的无本生意。虽然在当代中国,一切都可以被转化为娱乐和商机,成为即刻消费的对象,不过,如此集体性地贩卖和消费“末日”,还是带着那么一股子近乎愤怒的黑色幽默,引人注目。

借着这一股“末日”盛况——为什么不呢,我给当时选修文化研究课程的本科生^①出了这样两道题,作为他们的平时作业:

1. 如果你掌握着所有末日船票的分配权(100张),你的分配方案是什么?

2. 根据你的分配方案,谈谈末日之后你所设想的新社会运行的可能状况。

^① 2012年秋季学期,选修“文化研究导论”和“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分析”的本科生共三个班,合计400人左右。

这样的提问，没有标准答案，却也不容易回答。作为提示，我建议他们不妨看看电影《2012》。在那一年的“末日”热潮中，《2012》虽是一部借着末日预言发财的好莱坞大片，但给出的“船票”分配法，却颇有些复杂，并不全然只是娱乐。粗略说来，电影至少提供了以下几种既相互竞争又彼此互补的方案。第一种，是既有的金钱或权力可以直接换取船票。于是，各国政要和顶级富豪成了理所当然的登船者。不过，灾难来得比预想的要快，俄罗斯大亨虽购得了船票，却无法登船。教皇和美国总统，则出于对末日的理解，拒绝登船。第二种，是知识精英依靠文化资本兑换船票。当然，这一文化资本和船票之间的兑换，也不全然对等。以至于美国科学家得以登船，而最初发现这一灾难的印度学者和他的家人却被抛弃了；掌握科学技术的专家更容易登船，而小说家之流，比如故事的男主角，则未能跻身于这一兑换的行列。显然，最终决定何种知识可以兑换的，还是第一种方案中掌握了权力的那一批人。如果说前两种方案针对的是社会中多少有些特殊的群体的话，那么第三、第四种决定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命运。第三种方案，在影片中并未实施，不过是美国总统转述妻子的评论：前两种方案并不平等公正，也许唯一可行的方案是随机抽取。这意味着，人类放弃对自身和社会命运的决定权，将它交给天意。而第四种方案，虽非哪一方明确提出，却是整个故事都在讲述的“实际上”的分配之法：权力、金钱、知识可能都不是最终决定是否可以登船的条件，相反，友情、亲情和爱情，以及在此激励下的个人的不懈努力，才是芸芸众生为自己争得的真正船票。于是，作家、造船工人、不懂事的小孩子、八十几岁的老奶奶、小狗……，他们在克服各种困难后，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登上由末日驶向未来的方舟。

显然，这四种不同的分配之法，都不可能分别得到彻底的实施。因为当一个社会只剩下权贵之时，权力也便失去了展布的对象，金钱成为一堆废纸。而一个只有专家、没有超越自身专业界限的思考者和行动者的社会，恐怕也很难运行。随机抽取的方案，看似完全放弃人的主观意愿，最为平等，但实际上不过是无条件地复制现有的社会，将现有的一切可能

的美好和罪恶带入未来。而第四种分配之法——只有个人奋斗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既是资本主义最看重的社会组织逻辑，也是好莱坞大片大肆渲染的意识形态，则又总是依附于既有的社会结构方才成立。

就此而言，今天的社会，虽未遭遇电影中的灭顶之灾，但其整体的运行，却一刻也未脱离上述几类分配方案间的彼此啮合与相互掩护。在此种状况下，人们越是只依赖于单一方案理解和参与社会，一个为权势、官僚、金钱和“民主”所控制、持续生产着不公的社会就越是顺利延续。至此，表面上看起来荒诞怪异的末日大片，骨子里却是对社会现实的直白解释。它不仅复述着现实，更是把贯穿于现实中的基本逻辑，刻写进了可能的未来。

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听了我的建议，在思考影片之后提出自己的方案。也许是因为时间“匮乏”，大学里的课程永远满满当当，各色假日和考试又几乎占据了学生们所有的注意力；也许是不知从何种角度解读电影，尽管各类信息扑面而来，而大学生理解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却并未真正增强；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看似开放实则循规蹈矩的课程，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已没有了天马行空的兴致。最终，绝大多数学生方案中的分配逻辑，比《2012》来得更加直白和现实。

其一，严厉的“强者逻辑”。

也许是把世界末日作为一个从未遇到过的极端危机来看待，绝大多数学生不假思索地选择把船票给予“强者”。不过，什么才是“强大”呢？不同人的理解看似不同。

在有的同学看来，末世之后，世界蛮荒，只有身强力壮者，才能战胜自然。于是，肌肉发达、身体健康，成为“强大”的标准。衰老、疾病或弱小，一律拒之门外。在最为极端的分配方案中，20~35岁的男人获得了大部分的船票，只有一小部分名额给了妇女。因为在这一标准的“强大”中，女性不过是弱小无用的群体，只是因为能够传宗接代才不被遗弃。另一种对“强大”的定义，来自现代科学技术的辨别。把地球人集中起来进行基因测试，从中选取最优秀的前一百名，成了最简洁方便的

方案。较之于这两种生理意义上的“强大”，更多人则直接挪用今天社会中既有的强者定义。于是，政界领导、顶尖专家、商业领袖、世界首富，理所当然得到船票。新的社会自然也就由这一小撮精英重新创造。

无论是体能标准、基因检测，还是精英召集令，判断依据虽然不同，但贯穿其中的思路却大体一致。那就是，当人类社会遭遇重大危机时，活下来的机会“应该”首先留给既定的“强者”。于是，在自然实施丛林法则之前，学生们依据自己理解的“强大”，完成了“优胜劣汰”。

其中，只是有一位提出了对“强大”的疑惑：如果地球毁灭，谁也无法预知灾后状况，那么又何以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呢？

其二，“我”必须带上家人！

这是另一个被频繁使用的分配逻辑。超过半数的学生明确表示，一定要带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乍看之下，这大大不同于强者逻辑。因为家人或朋友，是因亲情、爱情和友情而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和照顾。它不仅和强者逻辑无关——任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家人必是精英或正当壮年，甚至还和强者逻辑相悖——正是千差万别、各有弱点的人，构成了人们彼此依恋和相互照顾的基础。

不过，有意思的是，如此表示者，在分配其余船票时依据的又往往是强者逻辑。在大多数的分配方案中，这两个逻辑并行不悖地运行。如果进一步深入这一“家人优先”的逻辑，便会发现，对年轻的分配者们来说，可以称之为“家人”或“朋友”的范围，已经大大扩张了：喜欢的演艺明星、时尚设计师、顶级厨师……。既然现代生活中“我”所熟悉和喜爱的一切，都属于“家人”之列，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那么所有这些都该也应该一同登船。

倒也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两者间的抵牾：“强者逻辑”适用于他人，而“家人优先”独为“我”服务。不过，对此的解释却是：“人是自私的”。在他们看来，既然“自私”是人的天性，那么因“我”而网开一面或标准不一，也就毫不奇怪。在这里，必须带上家人的“我”，完全不必考虑“我”的权力从何而来。而这个躲在自私“天性”背后，在末日之际掌握生杀予

夺之权，甚至决定人类未来的“我”，究竟和今天现实生活中的权贵们有何相似之处，更是被彻底忽略了。

其三，“劳动力”与“管理者”。

如果说，“强者逻辑”和“家人优先”间的互补构成了基本思路，那么进一步的分配，依赖的则是既有的社会分工原则。按职业的重要程度分配船票，是相当一致的选择。当代大学生对“社会分工”的实际理解，也由此凸显。

在他们看来，需要登船的职业，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银行家、律师、农民、建筑师、工人、心理分析师、演艺明星、厨师、裁缝、翻译、教师……。不过，在眼花缭乱的职业名单背后实际隐含的，却是一种对劳动/技艺相对僵化的看法。这种僵化，既表现为，现有社会中各种“高大上”的行业被理所当然地保留下来，至于社会重建为何首先需要这些类型的工作，却语焉不详；也表现为所有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劳动——种地、缝纫、煮饭烧菜、打扫卫生等，也被预留了位置，视为只能由专门人员提供的服务，而非每个幸存者应该或可能学习的技能。

不过，真正有意思的还不止是这样的“不假思索”。因为在分配者优先考虑的各项职业中，得票率最高的，既不是银行家，也不是农民、工人，而是“领导人”、“政治家”或“管理者”。紧随其后的是“军人”或“警察”。在解释这一选择时，年轻的分配者们几乎异口同声：带上强有力的“领导人”和“军人”，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只有他们可以维持秩序、防止混乱。于是，维持国家机器，特别是暴力机器的有效运转，成了优先考虑的目标。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被治理者在不同方案中共有的名字——“劳动力”。^①显然，一面是储备最强大全面的劳动力，另一面是实

^① 在中国，对一个年长者来说，被称为“劳动力”，是一种侮辱性的语言；对“70后”来说，自称为“劳动力”可能是一种搞笑或反讽；而对此后的年轻人来说，“劳动力”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自然无感的自我指称。“劳动力”一词被使用的历史，显然是非常有趣且值得追究的当代文化现象。这不仅涉及不同世代的人如何理解到劳动/工作，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还直接关系到与之伴生的主体的自我认识方式的变迁。

施最严格有效的管控，被看成了人类重获新生的最佳方案。^①

于是，当占领华尔街的口号——“他们是1%，我们是99%”——流传日广的时候，我在学生们的分配方案中读到的是另一组比例：只有1%的“我们”愿意把船票分给穷人或弱者，而51%的“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领导人”、“政治家”和“军人”。

基于上述分配原则展开对未来社会如何运行的想象(第二题)，自然困难重重。不难发现，年轻的分配者们，一方面普遍渴望自由、民主、平等，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为未来装配好了威权式的管理者和暴力机关。一方面将人类文明及其存活的环境视为理所当然——城市、资源、社会分工、工业文明等等，另一方面又对这一文明本身毫无信心，在毁灭之后似乎只能为最基本的生存做打算。一方面将个体视为功能性的存在——“劳动力”，另一方面又惯于依据个人喜好，选择性地复制社会。渐渐地，一个和现存社会几乎“copy不走样”或无法真正不同的未来社会，浮现在了眼前。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学生们没有认真思考，随便作答，何必当真。或者说，你教的这些学生并非“一流”，如果去问问清华北大，回答自然不同。也许，也许。

不过，我并不相信有这样的“也许”。因为无论是“强者逻辑”、“家人优先”，还是凝固的社会分工和隐匿其后的阶层固化，僵化的对劳动技能的理解，乃至对新的不同于今天的社会既缺乏想象的雄心也缺乏认真的准备，所有这些都不是某一群大学生才有的特征，而是当前整个中国社会的通病。指望一小撮“精英分子”扭转这种整体性的社会病症，而放弃数量庞大的青年群体的理解力、思考力和行动力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意义，则未免错判了这个时代的基本动因。

至此，如果说有一个“船票难题”的话，那么，它指的从来也不是学

^① 这一类的重生方案不仅体现在学生们的分配方案中，同样也体现在网络上的各类重生文中。在灭顶之灾中，完全依靠国家和军队的力量获得重生，是比较一致的思路。

生们理解粗疏、想象匮乏的现状，而是指当代大学生或青年群体对现实生活积累起的不满，这种不满由就业难、购房难、结婚难、城市生活难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催逼而成。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学校教育和媒体教育所形成的理解和参与现实的思路，又与社会中的既得利益群体和当权者们高度一致。于是，一方面，在上述逻辑的支配下，现实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对人的压迫和紧逼，构成了年轻人对现状不满的源头，而另一方面，由此持续累积起来的不满和思考，却无法形成对现实真正有效的质疑和挑战，更遑论形成改变它的动力。这也正是“末日船票”遭遇的真正问题。原本经由末日危机，人类社会获得了更新的机会，可能走向不同的未来。可实际分配船票的方式——尤其是当权者和无权者的分配逻辑如此一致之时，却使得人们只能不断复写旧有的社会结构，一再错失革新的可能。就此而言，世界末日的预演，不过是把当代社会面临的自我革新的窘境，浓墨重彩地标示了出来。

二、通识教育的地形图

不难发现，整个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类似的自我革新的难题。

这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廉价优质的劳动力、便宜的土地和优惠政策等条件，虽构成了中国的竞争优势，但在整个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这一优势势必无法长久维持下去。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需要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升级换代。

其次，这一无法维持，不仅来自于全球体系的竞争压力，也来自于在此过程中，日益积累的社会内部矛盾。依凭由发达国家确定的“强大”标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家人优先”的惯性，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对“劳动力”的生产和支配模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由这三种逻辑彼此啮合、驱动社会转型的后果也日益凸显。它不光表现为，经济发展高速但不均衡，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城乡差异进一步扩大，社会分层迅速固化；也指，权力腐败问题严重、政治改革难以推进，生态环

境迅速恶化,对“强大”的理解越发单一,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共识被一再腐蚀和破坏。

尽管有人将这些理解为为了经济发展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但问题在于,作为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的主力军,中国的青年一代正是在这一不断被“牺牲”掉的中国现实中成长起来的。当一个社会长期奉行单一的“强者逻辑”和“家人优先”的原则,大大小小的权力者总是推卸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一切责任,越来越多的公共福利被转化为只能在市场上购买的服务的时候,“求稳”和“自保”不仅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心态,青年们的“理想”以及追求理想的道路也变得越来越狭窄。如果说,在此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总是显得被动和消极的话^①,那么这一被动和消极的源头,从来也不是智力和基因,而是日渐成型的社会生存模式使然。

然而,身处新一轮由互联网和生态议题所主导的全球变革中,青年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和生活难度却不断增加。一方面,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渴求的,是既能够承受高强度、高流动性,同时又具有创造性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在这一轮新自由主义经济强力碾压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必须共同承担的社会危机也越发严峻。能否形成针锋相对的保护社会、处理危机的能力,已经成为对新一代人类的基本要求。就此而言,无论是积极自利,还是消极自保,在当前主流社会生存模式下成长起来的青年,都显得不那么合乎时宜。

正是针对这一不合时宜^②,或为了培养更合时宜的“创造性的人才”,中国大学开始推行通识教育或增加大类通识课程,希望可以生产出更符合当前形势下全球经济竞争要求的劳动力。不过,这一以配合

^① 2013年上半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批评青年的这种暮气沉沉的“不良”状态。

^② 这一“不合时宜”,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的说法,是:“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教育体制机制不活,学校办学活力不足……”。

市场需求为目标，由站在市场背后的国家所主导的通识教育，其实际展开的方式却是，仿造西方既有的通识模式，在越来越严格的数字化管理之下，要求学生养成自主和创新的能力。

以经典化为主导的通识教育模式和整齐划一的数量化管理，能否将中国学生驱赶入“创新”的轨道？这一点恐怕值得所有关心中国社会未来的人们，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首先是因为，创新和自由的意义，从来也不是自明的，而是在于，社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因它们的存在而得到了真正的改善和进步。倘若缺乏对整个社会状况的基本理解，缺乏对“何谓社会危机”的根本判断的话，创新和自由也就模糊了它的意义来源，成了无的放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大学之所以开发通识课程，针对的是不同文化和种族的移民大量涌入，旧有的西方社会价值观念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对彼时的西方社会而言，开展大学通识教育的主要目的，从来不在于由后发到先进的升级换代，而是在已经占据优势的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固本正源。因此，重新确认西方文明经典、形成社会核心价值，成为通识课程的基本模式。显然，中国当前展开的通识教育，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历史情境。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社会培育整体判断力的动力，来源于变革的压力——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来看，都是如此，更是因为，在经历了整个现代化的冲击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究竟什么才是应当通过学校教育延续的“经典”，本身仍处在继续创造和争议的历史过程之中。

就此而言，一味按照欧美既有的通识模式，依赖于数字化管理的技术手段，推行通识课程，不过是一次毫无主体性的模仿。正如船票分配方案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当代大学生早已耳闻目染了整个社会主流的生存逻辑。正是这些逻辑，构成了其判断力和想像力得以展开的基础。如果罔顾这一教育的基本现实，不分析既成的受教育者的心智地形图并加以改造，一味灌输自认为的那一套恰好被标记为“创新”或“经典”的知识的话，那么，被由此选拔和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以既有的生活

逻辑去整合新的知识，由此展开的，势必是在既有社会逻辑划定范围内的“墨守成规的创新”。

倘若上述质疑成立的话，那么，对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而言，其首要任务便是和学生一起，辨认和绘制已经布满了堑壕、堡垒和陷阱，也因此急需展开争夺的社会心智的地形图。实际上，这样的心智地形图，就藏在我们的课堂之上。只看我们是否愿意放弃固有的教导模式，挪开西方理论的直尺，促其现身。

就拿学生们构思的船票分配方案来说。针对主流的分配逻辑，教师应该开展教育。比如，在危机时刻，只考虑强者而排除老弱妇幼，是不义的行为。再比如，凡事优先照顾家人，在某种程度上，和今天所有的贪官的行为逻辑是一致的。不过，这样的教育常常收效甚微。因为只是说出“真理”而不考虑“歪理”如何形成或“真理”在现实中何以立足的话，那么其实际效果，便只能是：一方面，教师永远“真理”在握，但另一方面，这样的“真理”因无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不义现实而被“遗忘”。在某种意义上说，教师越是无视真理如何在现实中被扭曲的事实，就越是模糊了实际上需要介入和改变的现实，削弱了自己改造现实的能力。因此，在这里，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和学生一起分析由上述分配方案呈现出的心智地形图，搞清“正义”和“未来”得以生存、壮大的土壤状况。

首先，如果登船是为了人类社会的重建，那么“重建社会的目的是什么”，便是分配船票时需要正视和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有意思的是，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为什么这个问题不需要思考，或者说，这样的问题究竟在什么样的知识/感觉的结构中被“无视”，也就成了描绘其心智地图的第一步。

想来，社会重建的目的被“无视”的原因一定不少。其中，最根本的一条便是，在既有的心智图景中，“社会”的形象既是模糊的又是固定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往往作为“个体”的抽象的对立面存在。据此展开的谈论，总是将“个人”和“社会”视为明确而遥

远的两极，比如，“个人对抗社会”，“社会由无数的个体构成”或者“个体的发展促成社会的发展”等等。然而，这两者究竟在具体的历史状况中缔结何种关联，或者说，具体的关联方式究竟有何差异？对此的描述，却最为单调和含糊。^①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特殊性还在于，当国家控制和管理着绝大多数资源之时，“社会”既是国家垄断一切之后的别称，正如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交替使用“国家”和“社会”来指称中国^②，却又是人们想要挣脱这一垄断的一个极为模糊的企图——除了“国家”，还有什么？

如此说来，“社会重建的目的”这一问题之所以难以被认真提出和思考，恰恰是因为，对青年人而言，现实中的社会与个体、社会与国家这一系列关系以及对这些关系的描述，总是含混不清的。个体的改变，究竟如何能够引发社会的变动，个人的选择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对社会的变革具有意义？自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一类对个体与社会之间如何发生关联的具体描述，总是异常匮乏。^③年轻的分配者们对“我”的定位，正是在这一状况下发生。一方面，是这样的含混与匮乏，另一方面，个体又只能在具体的线索中发展出和社会的实际关联。于是，“家庭”成为唯一可以依赖的线索。在这一意义上说，“家人优先”不过是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得以成立，与社会构建起具体关联的方式之一。这一关联方式本身并没有问题。它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当个人与社会的关联方式只剩下这样一种时候，缺乏其他关联方式的个人，就势必陷入将人性简化为“自私”的危机。

① 关于这一点，雷蒙·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有更为仔细的描述。

② 就此而言，领导人和军队的高得票率，不过说明了中国这一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特有的模糊性。

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各类名人传记的畅销和流行，比如《乔布斯传》，除了传授个人主义和成功学之外，也可以被理解为：人们在自身所处的时代中，对个体与社会的具体关联方式被更具体、更生动地说明的渴望。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成长小说这一类型的文学作品，提供的便是对个人与社会如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具体联系的最细致入微的描述。相比之下，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中，越来越难以读到这一方面的描述，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在文学作品中往往是给定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阻碍了家庭之外的关联方式的建立呢?或者说,在现代社会中,是什么使得其他类型的关联,即使存在也不被“看见”和重视呢?其中,学校教育对人的生产,显然是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不仅是指,在长年累月的学业竞争、分数排名之后,学生之间被规训得只剩下了对手关系,更是指,在大规模的教育产业化之后,学校教育放弃了师生之间建立其他类型关系的可能。教师成为兜售知识的服务人员,学生成为购买知识的消费者以及此后有待自我推销的劳动力。无论处于什么位置,将自己“人力资本化”,成了最方便和安全的选项。当年轻人经过十多年此种教育的训练和熏陶,进入社会,他们对将个人和社会之间只能由经济建立关联这一点,更是深信不疑。对他们来说,一则从来没有见过或被示范过别的建立关联的方式,二则一旦踏上社会,个体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将进一步明确下来,在没有其他关联方式——除了“家人”——可供选择的状况下,此种经济关系势必完全支配着他们对日常生活的处理和想象。当单一的“强者逻辑”和孤立的“家人优先”成为仅存的关联类型时,这两种个人和社会的关联方式,自然不可能提供对人性的更丰富的理解。而一旦将自己的“自私”理解为天性,那么,个人与社会的其他关联方式,也就进一步失去了被讨论和探索的可能。阶级、集体、其他类型的共同体和可能关联的方式,都将被这一“天性”轻而易举地否定和摧毁。就此而言,“家人优先”,甚至于将“家人”的范围扩大到自己喜爱的明星或现代生活所需,与其说是分配者的“自私”,不如说是凸显了他们在思考个人和社会关系时的孤立无援和无效挣扎。

于是,我们发现,今天的大学生,要能够充满想像力地分配船票、构想未来,他们需要攻克的心智地形图上的堡垒,实在不在少数。在我们初步勾勒的这张心智地形图上,就包括:学校教育体制、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社会中可能占据的位置,由经济主导的单一的对“现代”的理解和想象,文化在这一想象中的作用,大多数人想象自身的方式,“市场”的意识形态功能,“国家”的模糊性质……。